



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 論文集

覆案的歷史

檔案考掘與清史研究

下冊

陳熙遠 主編



中央研究院

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覆案的歷史

檔案考掘與清史研究

下冊

陳熙遠 主編

中央研究院

覆案的歷史：檔案考掘與清史研究 / 陳熙遠主編.

-- 臺北市：中研院，2013.12

冊；公分.--（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第四屆）

部分內容為英文

ISBN 978-986-03-9508-2(上冊：精裝)--

ISBN 978-986-03-9509-9(下冊：精裝)

1. 清史 2. 歷史檔案 3. 文集

030.8

102025397

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覆案的歷史（下冊）

有著作權 侵害必究

發行人：翁啟惠

總編輯：黃進興

主編：陳熙遠

編輯委員：陳國棟、劉錚雲、賴惠敏、陳熙遠

編輯助理：吳月亮

出版發行：中央研究院

印刷者：長達印刷有限公司

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經銷商：四分溪書坊

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五楠圖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定價：新台幣 500 元

出版日期：2013 年 12 月

GPN 1010203192 ISBN 978-986-03-9509-9

本刊不負責來稿內容物之版權問題，由作者自負文責。

Papers from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EXPLORING THE ARCHIVES AND RETHINKING QING STUDIES

VOLUME II

Edited by Hsi-yuan Chen

Academia Sinica

開幕致詞

大會主席 余英時院士

中央研究院第一次召開國際漢學會議是在一九八〇年，原本希望以後每十年召開一次。今年是第四屆，但距第三屆已十二年，算是遲了兩年。

事實上，早在一九五九年已有人提議本院應該召開漢學會議。當時的院長是胡適之先生，他認為台灣的漢學研究無論在質還是在量的方面都還沒有達到他所期待的水平，因此力主緩議。這一提議卻引起了她對於所謂「漢學中心」的記憶和感慨。他說：

二十年前在北平和沈兼士、陳援菴兩位談起將來漢學中心的地方，究竟是在中國的北平，還是在日本的京都，還是在法國的巴黎？現在法國的伯希和等老輩都去世了，而日本一班漢學家現在連唐、宋沒有標點的文章，往往句讀也被他們讀破了。所以希望漢學中心現在是在台灣，將來仍在大陸。

但六十三年後的今天，我們對於胡先生的「漢學中心」說已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試一回顧過去五、六十年間漢學的發展，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兩點認識：

第一，漢學已加速度地擴散到一切專門學科之中，不但人文和社會科學的每一部門中都包涵著越來越多的漢學研究，而且在中國科技史的廣大領域中，自然科學的各部門也和漢學日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於是出現了一個奇詭的景象：漢學一望無際，觸處皆是，但是漢學作為一個專門學科（academic discipline）卻並不獨立存在，因為漢學研究基本是寄托在其他學科之中的，如語言、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宗教之類。

第二，二戰以後各國漢學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可是「漢學中心」卻未在任何地方出現。不用說，漢學研究在各國活躍的情形頗不一致，但即使是最活躍的國家也未曾取得公認的「中心」地位。事實上，如果我們分別考察各國漢學研究的大體趨向，便不難發現：主要由於研究的傳統和關注的問題彼此不同，每一地區的漢學都或多或少地展現出一種獨特的歷史和文化風貌。世界文化是多元的，漢學研究的傳統也不能不是多元的，這是我們今天共同承認的基本事實。

基於以上兩點新認識，我們可以十分肯定地說，胡適和他的朋友們當年最所縈心的「漢學中心」何在的問題，今天已自然而然地消逝了。如果有人堅持要在這個問題上討一個明確的答案，我祇好說：漢學猶如十六世紀布魯諾（Giordano Bruno）構想中的宇宙，其中心無所不在，其邊緣則無所在（"Its center is everywhere, its periphery nowhere."）。

自本院一九八〇年召開第一次會議起，我個人每一屆都曾參與準備工作。因此我可以很負責地說，我們的唯一目的便是給世界各地漢學研究者提供一個充分交流的學術平台，所謂「漢學中心」問題從來不在我們的考慮之內。我們承認並且尊重每一地區漢學傳統的獨特風格，但是我卻不願看到任何漢學研究社群走上自我封閉的道路。因此不同傳統之間的互相溝通、互相認識和互相影響是極其必要的。我們相信，過去本院主持的三次會議多少曾發揮了這樣的功能。我們希望本屆會議也能作出同樣的貢獻。

我最誠摯的心情感謝各地漢學同道們前來參加會議，特別是遠道冒暑而至的朋友們。我預祝大家有一次成功而愉快的學術聚會。

我個人因事不能到會，謹致最深的歉意！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序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王汎森

中央研究院在 1980 年舉辦了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其後以約 10 年的間隔舉辦一屆，至今已至第四屆。2010 年初我奉翁啟惠院長的任命，擔任副院長一職，當時思考著幾件應該進行的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漢學會議。在翁院長的大力支持下，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順利召開，上距第三屆已有 12 年，而距離第一屆更超過 30 年。30 多年來，與會的學者在改變，討論和關注的議題也隨著時空的推移，不斷的變遷。

當代社會資訊發達，空間距離縮小，連帶促進了地球村的形成，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使得「漢學」已不再是專屬華人的學問，而儼然成為國際性的議題。學者關心的議題，也不再限於一時一地，而更多跨領域甚至跨國界的觀照。

從這一屆所發表的論文觀察，我感到較諸以往有幾點不同。在這裡僅以史學為例，從「主題」、「材料」與「工具」三方面略作討論。

首先是「主題」的擴展，以歷史研究為例，早已跨出傳統「帝王家譜」的框架，進而更多關注基層社會的歷史，關心人民的生活。討論的議題幾乎可說已經沒有局限而充分展現多元。

從「史料」方面講，傅斯年所揭示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的精神，繼續得到重視與發揚。尤其近年來大量新材料的出土，大幅改變了我們對問題的看法和認識。這裏所說的新材料，不只限於考古出土的史料，還應該包括過去被列為禁燬或長期處於邊緣的史料，這些以往不能看或不易看到的東西，經過大量的刊印後，如今都觸手可及，無異於「新出土」，提供給學者們一個研究的新寶庫。此外，許多數位化資料庫

的建立，使得過去數十年皓首窮經都做不到的事情，現在也許一個按鍵彈指間就可獲得，為學者帶來無窮的「近用性」。當然，我也必須強調，「檢索」不能代替閱讀。

從「工具」而言，科技帶來許多研究的新工具，數位工具的興起，使研究者與材料之間的關係得到全面的改變。另外如 GIS 的應用，方便我們用空間來思考事情，也使得研究的面向從單點連結到多點、甚至擴展為全面。這些新工具的產生及應用，是過去幾屆漢學會議所無法想像的事。當然，以現代科技的日新月異，我們可以想像到第五屆時必然會有更新的工具出現，其新異的程度也可能是我們現在無法想像的。

第四屆漢學會議的成功召開，首先要感謝翁啟惠院長的全力支持，余英時院士慨允擔任大會主席，黃進興院士和黃樹民院士力任艱巨。世界各地學者的熱烈響應，更是我們必須表示敬意與謝意的。

在會議召開一年後，全帙 22 冊的會議論文集得以出版，這要歸功於出版委員會的不懈努力以及李宗焜博士、葉光輝博士與各冊主編和學者專家的配合。不論會議期間或出版過程，還有無數的助理同仁都付出了大量的心力。在全書即將付梓之際，我謹代表中央研究院對他們的貢獻表示衷心的感謝。

序

大會祕書處

二〇一〇年四月，翁啟惠院長由於關切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特別指示，籌辦「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歷史語言研究所會同民族學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中國文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語言學研究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等七個研究單位，共同配合辦理。經過整整兩年的努力，遂於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如期召開大會。各國應邀發表論文的學者共計有二九二位，主持與評論者計四十三人，全體與會人員更達一千六百之眾，堪稱學術界的一大盛事。

本次會議具有四大特色：首先，進行深度討論，會議論文發表者，兼做主持人與評論，角色彼此替換；其二，跨學科、跨領域、跨地區的探討；其三，新領域與新議題的開發與探索；最後，迥異於往昔只有資深學人參加，此次廣邀富有潛力的年輕學者與會，副教授以下達總人數四分之一以上。

會議期間，雖值颱風侵襲，與會人員一本初衷，風雨無阻，踴躍出席，討論熱烈，成果甚為豐碩。會後，復承王汎森副院長交待，成立編輯委員會，審議提交論文，俾便結集成冊。茲將最後定稿梓行，以供學界分享，並就教於諸方大家。

最後，本會議論文集得以刊行，必須感謝各分冊主編，尤其是出版委員會的編輯祕書李宗焜教授。

謹列本屆國際漢學會議攸關工作人員如下，並致謝忱：

主席兼召集人 余英時（中央研究院院士）

祕書長兼副召集人 黃進興（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副祕書長 黃樹民（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執行祕書 林富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籌備委員（依姓名筆畫順序）

胡曉真（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陳恭平（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黃克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鄭秋豫（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謝國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顧問（依姓名筆畫順序）

丁邦新（中央研究院院士）

王賡武（中央研究院院士、新加坡國立大學）

李亦園（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歐梵（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

杜正勝（中央研究院院士）

杜維明（美國國家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

郝延平（中央研究院院士）

張玉法（中央研究院院士）

梁其姿（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

莊炳淦（中央研究院院士、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許文雄（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

許倬雲（中央研究院院士）

楊國樞（中央研究院院士）

葉文心（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序

主編 陳熙遠

過去仰賴政治權威認證定位的「正史」，從現代史學的角度來看，既然是因「政」而「正」，其所享有的「正統」地位，殆如「政統」一般，保固的時效其實相當短暫。隨著傳統「正史」迷思的解構，一度經由皇權欽定的「二十四史」，終究不過是「二十四史稿」，或「二十四史史料集」。現在若仍有人期待透過政治力量的動員，挹注大規模的人力物力，進行任何編修正史的工程，即使裝潢鉅帙，堂皇上市，充其量也只是提供一特定群體在一時一地進行歷史的拼接與想像，聊備一說而已。畢竟「過去」已不再是一成不變的靜態圖像，可以由任何權威擅自拍板定案；歷史永遠是一部未完成的稿本。

儘管由權威拍板定案的「正史」已不再適合作為歷史書寫者憧憬的崇高夢想，但無所不用其極地琢磨「信史」，仍是治史者得以交流對話的基本共識。當中國從帝制轉向共和之際，歷史研究也正走向關鍵的分水嶺：過去正史既成，撰修刪補過程中參酌援引的檔案史料往往束之高閣或棄若敝屣。而今作為佐證憑據的檔案史料卻具有永遠保存的價值，供由學者反覆推敲。相較之下，專業史家綜攝各種史料所發表的研究論文，在學術市場裡可能如彗星劃空，稍閃即逝，甚至是銜石填海，徒留漣漪。我們可以這麼斷言：對現在的史學探索者而言，二手的論文存活於一時，一手的檔案卻會珍藏至永久。

當清朝走入歷史的那一刻開始，清史研究的推進就與檔案的運用密不可分。透過新舊檔案的考掘與校勘，同時徵驗官方記載與私人撰述，將可為懸案的臆測提供落實的佐證，甚至對已定案的論斷提出質疑的駁證。中

央研究院舉辦的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是促成本書集結的因緣，我們多方邀約海內外研治清史的專家學者共襄盛舉，或就其新近開展的研究提出階段性的成果，或對琢磨經年的課題進行總結性的回顧。收錄在本論文集的論文議題相當多元：包括清代檔案整理的歷程、滿文檔案的甄定與比對、行政文書的匯編與應用、以及從文書撰寫格式與措辭的分析，探討中外關係的認知與變化。亦有針對特定的研究議題入手，進行切片式的探討：諸如地方政府與基層社會、邊疆貿易與民族互動、稅契協定與財政管理、官方祀典與民間信仰。儘管每篇關注的焦點不同，探究的課題與分析的方法亦各異其趣，但對檔案的考掘、史料的反省，無疑是彼此交光互影的共通之處；透過檔案，覆按前人已發之論，或發前人未發之覆。

檔案的運用與檔案的整理與開放密不可分。白彬菊教授的論文縷述自清代肇建以降將近四個世紀裡，清代檔案建置與保存的過程，以及在各個階段裡各種檔案如何被整理與運用。白教授猶如進行一場現身說法的歷史導覽，除了列舉各類檔案的清單與目錄、勾勒海內外學者運用檔案所產生的開創性研究，更融入了作者的親身經歷與訪談紀錄。引領讀者登堂入室，一窺清代檔案的寶藏地圖。這篇論文本身可說是一份清代檔案史的見證紀錄。

以滿文或其他非漢文撰寫的文書檔案，向為海內外研治清史的學者所重視。莊吉發教授以現藏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滿文原檔》，與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滿文老檔》兩種同源異書的文本進行校勘比對。前者以過渡時期的舊滿文書寫，後者則以加圈點的新滿文重新譯釋。莊教授不厭其煩地就其中涉及清朝前期的滿洲語文的演變、民族神話起源以及各種朝政宮闈的傳說，一一加以對勘梳理。

狹義而論，檔案乃度藏於官府的公文書信，但公文書信也可能以不同形式流傳於世。傳統的公牘，原是作為官員參酌借鑑的範本，可說是早期將行政文書整理出版的一種形式。魏丕信教授彙整歸納出兩種不同類型的公牘：一種出現於晚明，為個別官員公牘的選集或彙編，諸如文移、稟告、

告示與判語。一種則出現於清中葉，大量從政府部門刊印或傳抄的檔案中摘錄集結而成，包括成案和說帖。前者主要展現個人卓越行政能力的範例，後者則提供司法與行政的便利綜覽。魏教授引領我們考量各類行政文書在加工處理的過程，編纂者或有不同的動機與考量，也必須注意到公私檔案間的關連與差異。

清代檔案中中央與地方的往來文書允為大宗，既可從中檢視中央的掌控與地方的因應，亦可從中尋繹關於基層社會各種面向的諸多線索。杜家驥教授即以嘉慶朝刑科題本為例，通過對大量案例的彙整、歸類與分析，檢視基層社會中家族成員間環繞著生產與生活所形成的人際關係網絡，並總結這些判案實例，發現清代實際的量刑原則殆以血緣關係為核心考量，日常生活中密切互動的親緣家屬反而居次。劉錚雲教授植基於過去的研究成果上，以雍正十二年（1734）的「官缺更定」為切入點，考察官缺制定後君臣之間、中央吏部與地方督撫之間在用人問題上的政治較量。該文不僅綜合宮中檔、上諭與題本等多個檔案，更別具慧眼地運用《雍正內閣六科史書·吏科》進行深入考掘，並從中梳理出：帝制裡的君臣關係其實是彼此不斷互動交涉的過程。即使在皇權達於頂峰的雍正年間，地方督撫仍能藉由特例題請的策略，既在表面上順服皇帝的權威，又達到其以更改官缺掌控地方人事權的目的。

清代檔案關於中央祀典與民間信仰的紀錄極夥，過去研究者泰半集中於秘密結社與邪教活動為主。黎志添教授另闢蹊徑，以其長期在廣州府及其轄屬縣級進行地方廟宇碑刻文獻搜集與整理為基礎，重新檢討明清士大夫對民間神祠廟宇的立場。原來許多地方上的官僚和士紳都積極參與各類民間神祠廟宇的創建、復修、集資，並受邀撰寫碑文。可見儒教基進主義對正統與異端的二元區分，其實並未反映在地方鄉里的實踐上。筆者的研究則是透過官方檔案及地方志書的參證對比，論述壇祭與耕禮合一的先農信仰，在清代如何從中央推廣佈建於全國，並指證儒家古典中郊祭的理想在佈建於全國地方的過程中，僅憑官方的力量勉強維繫，終究會隨著政治

權威的褪蝕而逐步土崩瓦解。若能呼應民間的常用日需，積漸生根，則官方祀典的原貌雖不免在混融的過程中產生異變或遭到扭曲，但終能與地方的生態、群眾的生活產生有機的聯繫，以轉化的型態屹立開展，甚至生意盎然。

在解讀檔案或一般文獻的過程中，研究者主要關注在文字訊息所提供的人事時地物等種種蛛絲馬跡。岸本美緒教授則以敏銳細膩的視角，提醒我們留意官方文獻的措辭用法與書寫格式。她以明清兩代的《實錄》以及士人所編纂的經世文編為主要分析史料，對國家關係的語詞如「中國」與「外國」、「天朝」與「夷狄」等詞彙進行量化統計，並在質性分析的層次上，爬梳這些措辭出現的時代脈絡，以及格式用法上的細微差異。從而闡明這些關於國家定位與國際關係的語詞使用在不同時期的演變轉化。

爬梳檔案並參證現存史料進行個案的研究，毋寧是清史研究者的基本訓練。不論是人物的行誼交際，或是事件的因果牽繫，檔案往往能提供直接或間接的線索，更具體地甄定人事的空間網絡與時代脈絡。劉小萌教授即以清中葉完顏麟慶的家族為例，利用年譜、檔案與方志，從而勾勒出三種與滿人家族互動密切的漢人——妻妾、塾師與幕客，此三者間又有交疊互動。而幕主與幕客並非簡單的雇傭關係，其間還穿插著師生、姻親與地緣關係，可說是一種複合交織的人際網絡。從其研究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滿人在其固有的旗人社會之外，還存在著各種與其他族群互動的關係網絡。陳國棟教授以其豐富的海洋史研究學養，以及其游刃出入於中西文檔案的考訂功夫，釐清陳昂與陳瓚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禁止南洋貿易的決策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不僅考掘出康熙五十六年廣東碣石鎮總兵陳昂的原奏全文，同時更確定了當年禁止南洋貿易的決策之發動者，應為福建巡撫陳瓚，彌補了清代南洋貿易決策過程中的關鍵闕疑。

作為一多元民族的征服王朝，邊疆、邊界與邊民的處理與安置，一直是清朝重視的課題。馮明珠教授試圖解決學界長期以來關於「欽定藏內善後章程」的原始版本，以及藏、漢文本異同上的諸多困惑。作者利用相關

檔案，不厭其煩地對該章程條文逐條比對，同時並從決策過程與公文流程的角度進行分析。透過作者的詳細比對，學界尋找多年的「欽定藏內善後章程」的母本，原就埋藏在乾隆皇帝陸續寄發福康安等執行善後章程的〈廷寄上諭〉，以及在福康安奏摺的硃批裡。十八世紀中葉新疆底定之後，內地民人便絡繹西進，對伊犁一地的人口結構與社會生態產生重要的影響。華立教授運用檔案史料進行個案分析，並配合官方典制與鄉土志書，對乾隆至道光年間內地商民在伊犁地區的聚集過程、經濟活動和生活方式進行具體的考察。循序討論內地商民的聚集、人數增長與民政管理體系的完善，以及商民具體從事的各類經濟活動、社會關係與日常生活，為清朝在準噶爾盆地的經營，包括商民群體各類的經濟活動，提供了新的證據和觀察。同時，並對過去學界聚焦於漢人移民提出修正，提醒讀者留意內地商民中還包括大量的回族移民，具有穆斯林社會特有的族群意識和行為模式。在中俄貿易的互動往來方面，賴惠敏教授以十九世紀在恰克圖貿易的山西商號為考察對象，不僅廣泛運用皮藏兩岸檔案館的史料，更嘗試運用原藏於蒙古共和國國家檔案局的相關館藏，鉅細靡遺地統計並分析晉商茶葉貿易的種類、產地、價格與數量，同時對照俄國學者科爾薩克（A. Korsake）《俄中商貿關係史述》（1857）一書。最後賴教授認為咸豐十年（1860）俄商到漢口設廠生產機器製作之磚茶，固然影響到晉商的發展，但當時地方政府頻以釐金、稅捐的徵收填補財政赤字，導致貨運運輸成本大增，恐怕也是促成晉商茶葉貿易衰弱的重要原因。

在清代的檔案中最乏人間津者，莫過於繁瑣枯燥的戶科財政題本，鄧海倫教授卻以其獨到的計量分析，討論盛清時期中央戶部在調配省級財政支出的機制，並特別關注到兵餉的高度比重。作者現身說法，展示如何將斷爛朝報中的數字紀錄，轉化為探討清朝財政管理的蹊徑。陸康教授試圖跳脫地方政府腐化的舊調，藉著檢索地方行政官員的檔案，從財政與司法的角度，重新檢視地方官員在處理稅契上所遭遇的實際問題。作者認為儘管清代檔案文書經常提及胥吏或官員貪污造成「契稅」實施成效不彰的種

種弊端，但我們必須嘗試辨認出隱藏在官方文書字裏行間的真相，辨識出土地與房產交易在個別地方社會裏的複雜運作系統，包括對房地產缺乏明確定義的法律概念，地方行政官員與其僚屬無法因應不斷成長的房產交易數量，進行有效的掌控或處理。

本論文集當然無法囊括清史研究與檔案運用的全豹，然從一篇篇學者的心血之作，以小窺大、藉微觀宏，不僅內文披露的實情，或是書寫的格式，以至具奏者的措辭或收覽者的批示，都可提供研究者仔細推敲的線索。適可印證：檔案的考掘，既可驗覆歷史的真相，甚至足以顛覆歷史的習見。

對檔案內容予以抽絲剝繭，或是進行系統的比較研究，本是研究者的使命與職責。而發表研究成果的論文裡最容易忽略的致謝對象，是那一群曾為整理檔案默默付出心力的工作者。尤其在上個世紀的朝更迭、烽煙動盪的過程中，中央或地方的檔案散佚損毀無算。因此我們有幸利用這些倖存的檔案，從中檢覆歷史的發展線索，必須感謝許多有名無名的前輩們為這些檔案奔走。當然，還有許多中央或地方的檔案尚待發掘，而已經發掘出來的檔案可能尚待整理編目。至於檔案的整理，從早期基礎的裱褙修補與編目著錄，隨著網路科技的提升，圖像掃描與檢索數據庫的建立，促使檔案從府庫禁中的秘藏，逐步開放為共享的公用資源，先後無不仰賴許多有名或無名的工作者的參與。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整理明清檔案的過程中，我們間或發現早期整理檔案者留下的箋條，有些上面簡單註記該卷宗的年代與性質，以及負責整理者的名字。名字相當陌生，但也正因為在這些陌生前輩的胼手胝足下，整理過的檔案或以鉛字重排、或複製影印、或以數位掃描等不同的形式對外公開。由於他們的付出，出土的檔案成為塵封的歷史最好的見證。

目次

余英時	開幕致詞.....	i
王汎森	序.....	iii
大會祕書處	序.....	v
陳熙遠	主編序.....	vii

上 冊：

白彬菊 (Beatrice Bartlett)

清代檔案論述的回顧—— 1616-1999	1
-----------------------------	---

莊吉發

《滿文原檔》·《內閣藏本滿文老檔》與清朝前史的研究	59
---------------------------------	----

Pierre-Étienne Will (魏丕信)

From Archive to Handbook : Anthologies of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in the Qing	145
--	-----

杜家驥

清代檔案刑科題本的史料價值——以「清嘉慶朝刑科題本」所反映的清代基層社會關係為例	191
--	-----

劉錚雲

皇權為中心的權力競逐——以清雍正十二年官缺更定為例	237
---------------------------------	-----